

“老人不老”：乡村自组织养老模式及其社会基础

——基于湖北省 G 乡老年人协会的调查

刘超¹

【摘要】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带来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衰落，乡村自组织养老模式是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模式。以湖北省 G 乡老年人协会为例，“老协”作为老年人自组织的一种方式，为老人提供生产互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自组织有效整合了老年人力资源，发挥老年人自身作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构建了属于老年人自己的公共文化空间。村庄熟人社会为乡村自组织养老模式提供了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自组织养老模式通过熟人社会内社会互助、道义支撑和自在性空间重建了村庄内部的养老规则，将老年人组织起来，让“老人不老”面对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困境，通过发掘基层自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自组织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农村养老 自组织模式 熟人社会 互惠机制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2)-05-0098(09)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时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农村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预计“十四五”期末，老年人口数量即将突破3亿人，届时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国家。随着农村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中青年群体的外流致使老年人成为流动时代乡村社会的留守群体，由此塑造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分布格局，并且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要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典型特点。^[1]面对此种情况，2018年9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幸福院等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显示出国家对该问题的关注。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以“孝”为道德支撑的家庭养老，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转型，家庭养老出现了一系列困境。现代化导致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家庭的传统照顾功能弱化。随着年轻人进城，家庭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带来了老年人照料的缺失，一些基本的生活照料问题都难以满足，在吃、穿、住、生活环境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老人的生活环境恶劣。在精神层面上，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精神层面上带来的负面影响，留守老人长期独居在家，静默夕阳成为村庄常态。^[2]此外，随着老年人家庭地位下降，农村老人的公共交往空间萎缩。^[3]

针对家庭养老的不可持续的困境，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两类视角。一是人口学视角，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提出了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思路，^[4-5]实现政府、家庭、社区、机构的协作共治，其目的是针对不同的养老服务对象，建立国家养老、社会化养老和市场化养老等模式。机构养老是市场化养老的一种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集中为不同类型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老年人能得到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但是老年人脱离乡村社会，缺少自由，缺少精神慰藉，缺乏居家认同和亲情滋

¹作者简介：刘超 讲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编号：skbsh2021-0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2021年度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编号：SR21A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养。^[6]同时，机构养老的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农户的收入，养老费用支出高，家庭负担重，^[7]由国家支持的福利机构则存在监管困境和运行成本高昂的问题。居家养老的优势在于有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养老成本低，但是子女必须有照顾时间，^[8]同时，居家养老的多样化服务成本一般由政府承担，政府财政的压力相当大。^[9]更加重要的是多元合作易产生的效率低下问题，公共伦理的缺失，责任模糊带来的问责困境等问题。^[10]二是社会学的视角，具体分析农村老年人群体及其需求层次差异，关注供给模式和老年人群体及其需求的契合性，侧重从组织机制出发。一些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需求、人际交往需求、情感需求、文体娱乐需求、安全需求和医疗需求等需求存在多样化的特征。^[11]针对此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理念，并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12]互助养老的理念支持下，一些地区开展了各种实践，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村幸福院”模式。该模式发源于河北省肥乡区前屯村，在该村的实践相当成功，其最鲜明的特征和主要的运作方式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13]但是在向全国各地推广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困境，如相关法规政策不健全，容易引发责任风险，资金注入不稳定运转难以持续等困境。^[14]

综上，既有研究中国农村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人口学视角将老龄化作为问题和负担看待，因此侧重从供给端论述国家政策和资源投入，忽略了农村老年人和农村社会中蕴含的养老资源。一是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生活的乡村社会基础和基本社会背景，将乡土社会等同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缺乏对老年人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关注，由此，这些研究就忽视了基层社会所蕴含的丰富的养老资源。二是强调了农村老年人的消费属性，将老年人视为消耗社会产品的弱势群体，视为“废弃的生命”，忽视了老年人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其关键问题是没有对老龄人群体及其需求类型做进一步分析，一类是特困群体，主要是生存保障需求，由国家民政兜底。第二类是高龄失能失智群体，主要是日常照料需求，在既有家庭养老之外，市场化养老为主，高成本，缺少生命尊严。第三类是普通老人群体，主要是日常交往和娱乐需求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需求等。后两者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重点。实际上，农村社会蕴含着丰富的养老资源，农村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被照料者”，而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将老人组织起来，是对社会公益力量的拓展。养老的主体仍是老年人自身，要充分发挥老年人自娱自乐、互相照料的作用。社会学视角提出的“互助养老”的核心问题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考核任务，没有合理利用农村原有的养老资源，将农村老年人组织起来，依靠老年人自我激励维持互助养老组织的有效和可持续运转。

基于此，笔者依据互助养老的理念，提出农村自组织养老模式，即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发挥老年人的自我特长，在生产、生活互助和精神慰藉等层面开展互帮互助，同时依靠低龄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帮助高龄老年人。在奥斯特罗姆看来，自组织是建立在信任关系和自主协商基础上的一种迥异于层级和市场的第三种治理模式。^[15]罗家德认为自组织是一种建立在包括情感性、认同性关系以及共同志业基础上的治理模式。^[16]这种基于一群人的自我组织带来的自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效率的方式，能够直接体现合作群体的需求，并有效克服政府模式的低效率和市场模式的不公平。中国农村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血缘和地缘的高度结合加上姻亲关系，使得农民在宗族、村庄等小群体内部有着密集的社会关联、高度的信任和强烈的认同感。明乎此，农村熟人社会网络为自组织养老提供了可能。本文的经验材料源自于笔者及团队在 2021 年 9 月份对湖北省恩施市 G 乡老年人协会（以下简称“老协”）的实地调查。

二、自组织养老模式的个案呈现

在快速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巨潮下，中国社会养老的难点和痛点都在农村，而发展农村“老协”成为促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2012 年，湖北省恩施市 G 乡的退休干部张必斗回到村庄，组建了 L 村老年人协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该组织模式扩展到了周边的五个行政村，辐射了周边两千多在村的老年人，为老年人生产、生活和情感互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平台，发挥了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功能。

1. 老年人协会的建设实践

L 村地处恩施市 G 乡西端，山高路远，地少物薄，距恩施市城区 100 多里，典型的边远乡村。村庄的生计模式呈现“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绝大多数青壮年均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老年人成了较大的留守人群。截至到 2020 年底，L 村有村民 460

户、村民 1400 多人，年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 299 人，占村名总数的 16.4%。这些留守老人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自己逐渐丧失劳力同时，还继续担负着看护家园、农业生产、照顾孙辈上学读书的重任，他们常年形影孤单、精神空虚，遇到生病或重体力活需要互相帮助，此类老年人在村老年人群中占 70%；另一类是从政府机关、部门单位退休回家的干部职工，他们生活有基本保证，但缺乏学习，生活空虚，越老越退伍，有一技之长，但没有发挥的空间和展示平台。

张必斗先生 1948 年 10 月出生在 G 乡 L 村，1976 年 7 月入党，2008 年他从 G 乡政府退休。当张会长回到村里，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低，精神状况差，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共同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恰好当时他从新闻中看到一些地区组织了“老协”，他决定在自己的家乡组织老年人成立“老协”，发挥老有所为的精神。张会长首先把乡村的退休干部、退休医生及退休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村“老协”并被会员们推举为会长。目前，五个行政村都建有“老协”活动中心，活动中心一般相邻村委会办公室，有棋牌室、读书室、电视、自助食堂和休息室。在自然村建立了老年人之家，一般是积极份子将自己家空闲的房间腾出来放置桌椅板凳供老年人休息娱乐之用。

截至到 2021 年 9 月，L 村共有会员 31 人，志愿者 487 人。“老协”成立后，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为宗旨。老年服务中心确立了“一学二帮三娱乐”工作模式：一学，即学政治，学法律，学技术，让老人老有所学。二帮，即组织协会会员与农村贫困老年人结对，开展一帮一的帮扶活动，让老人老有所依。三娱乐，即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观光旅游，读书看报，自编自演宣传节目等，让老人老有所乐。

最先加入协会的是退休的老干部、教师群体，构成了协会的积极份子，在他们的带领下，众多的一般农民也加入了协会。目前，周边的 5 个行政村均成立了“老协”组织。在资金来源方面，目前主要靠地方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一个老年协会一年的运转经费大约为 2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演出活动的相关开支。由此，在老协的带领下，在村庄内部通过公建民营的方式，自组织实现了村庄养老资源和国家资源的对接，激活了村庄老人资源，老人自己组织自己，自己帮扶自己，激发了老人自身的自主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表 1 湖北恩施市 G 乡老年人协会基本信息（2021 年）

协会名称	成立时间	会员人数 (人)	辐射人数 (人)	场所面积 (m ²)	经费来源	组织架构	日常活动
L 村 “老协”	2012.9	31	487	70	发会费、各级政府拨款 及社会捐款	1 名会长， 3 名副会长	文艺健身活动，打牌，下棋，聊天等。 重阳节组织全乡老年人的文艺活动
S 村 “老协”	2013.12	18	357	70		1 名会长， 2 名副会长	
W 村 “老协”	2014.3	18	363	100		1 名会长， 3 名副会长	
J 村 “老协”	2014.7	18	676	100		1 名会长， 2 名副会长	
Y 村 “老协”	2015.1	25	296	80		1 名会长， 2 名副会长	
T 村 “老协”	2013.12	18	797	100		1 名会长， 2 名副会长	

2. 社会效果

多年来，“老协”积极发挥组织优势，组织和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开展互帮互助，在生产生活互助、身体照料、情感交流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协会的互助模式是“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帮助身体行动不便的”这种取长补短、结对帮扶的互助式养老。

第一，生产互助，助力经济发展。山区农业生产有独特的劣势，由于山高路远，坡地陡峭，缺少机械支持，只能靠肩挑背扛，老年人由于体力差，需要团结互助共同应对生产事务。“老协”成立以后，积极引导老年人开展互助生产，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比如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的田地浇水，老年人一起守护渠道等等。

案例 1：生产互助。Y 村因当地盛产油竹而得名，每年能生产水竹、油竹笋 3 万多斤。每年，村里的留守老人都会采集竹笋供自家食用。但山大人稀、交通不便，非常优质的有机绿色食品也卖不成钱。张会长建议，老年人将竹笋采摘回来，简单加工之后，再由老年人协会统一将产品包装成袋，摆放在老年人协会场地的门口外面游客来玩，便可以销售，每袋 20 元，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

第二，生活互助，提高生活质量。在“老协”的直接主导下，在 12 个自然村设立了养老互助中心户，推荐了 12 名中心户长，由户长牵头，开展老年人互助式养老活动，对生活有困难的老人进行帮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案例 2：生活互助。刘斌清是 72 岁高龄的老人，在她住地附近有 14 个空巢老人，子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使这些空巢老人不寂寞、生病有人过问和关心，她就将这些空巢老人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经常打电话进行慰问、了解生活及身体健康情况。抽时间串门与这些空巢老人谈心、聊天，解除空巢老人心中的寂寞和孤独。有位 94 岁的空巢老人病了，她就上门去关心，帮助弄饭、找来医生看病治疗，派人轮流照顾。为了使这位高龄老人早日康复，不寂寞，她把自家火盆拿来给老人用，把自家音乐光盘拿来放着给老人听。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使这位老人很快康复。

第三，情感交流，促进村庄社会和谐。一是适时组织老人到老年人日间活动中心，参加健康友谊的休闲、娱乐。主要是组织打牌、下象棋等活动。有的到“老协”图书室看书、看报，丰富自己的晚年文化生活。二是发挥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逢年过节，“老协”组织老人参加健康有益的休闲、娱乐活动。

案例 3：娱乐互助。J 村自从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后，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老年人以前都是打麻将度过闲暇，现在开始了排练娱乐节目等群体性活动。村民胡光英今年 58 岁，她说：“以前没事的时候就是整天打麻将，自从成立老年之家后，不打麻将了，现在就是和老姐妹们排节目、到处演出。老姐妹们住得比较分散，排节目，好几个都从 5~6 公里以外赶往我这里。现在精神充实了，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作为村庄中的内生型社会自组织，“老协”能够有效应对村庄中不同老人相对分散的需求。自组织养老模式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养老模式，解决了“留守老人”生产困境、生活困境和精神孤独、无人关爱等“老年”精神问题。相对城市的异质陌生场域，依托熟人村庄这一空间，村老年人能够实现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统一，实现经济供养成本和沟通交往成本递减的统一，实现自主养老与互助养老的统一。

三、自组织养老模式的运作过程

自组织养老模式的核心是将农村老年人组织起来，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优势，互帮互助，共同应对生产生活的难题。其运作过程包括了四个层面，即双重动员与社会网结构的形成，契约规范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多方资源的整合和组织认同与互助的可持续。

1. 双重动员与社会网结构的形成

“老协”是从一个核心人物动员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以能人为核心的关键群体，进而拉会员、扩展出自组织的社会网。农村老年人中的组织者是养老需要自组织形成的核心力量，老年组织者构成了农村自组织养老最为宝贵的优势资源，成为了“关键少数”。一般老年人的各种能力也在组织动员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形成了优势资源。

(1) 精英动员。首先是发现和识别机制，即将社会精英从村民中筛选出来。“老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其创建与发展离不开新乡贤的组织动员。张必斗会长是“老协”的首任会长，也是一名国家退休公职人员。其退休之前是村书记，与群众相互熟悉，建立了相当高的信任感，具备了一定的权威基础。在他的号召下，两河口“老协”的初期会员参加者有18人，这一群体均是出生于该村的退休老干部、教师。这一群体有退休工资，具备了组织运作的物质基础，子女已经结婚成家，完成了人生任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其次是激励机制，即激发和保持积极分子的积极性。“老协”的组织成本很低，会员没有工资，全是志愿者，这是一种低成本、高福利的运作模式。会员是村庄社会的精英，不仅有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有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愿望，获得社会激励的积极性。张会长将这一群体从一般群众中识别出来并组织起来，一方面是实现群体内部的自娱自乐，度过闲暇时间；另一方面，为老年人进一步实现人生价值搭建平台。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他们通过组建“老协”，组织老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获得了社会影响，也赢得了声望。

(2) 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可以称为初次动员，旨在发掘辅助力量，这只是动员的第一步，动员的关键是积极分子对普通村民的动员，即二次动员。村庄社会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新乡贤这一群体的社会关系依旧在村庄中，他们与普通老年人是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他们相互熟悉，彼此信任，动员的成本相当低。在这一社会关系基础上，社会精英需要明确社会组织的功能与组织方式，照顾到大多数老年人的利益。张必斗会长在成立了“老协”后，利用积极份子社会关系，采取了一对一结对的方式，安排一个会员结对一个普通群众，这些群众往往是他们熟悉信任的一般群众。同时，“老协”开展“老年之家”的活动，在自然村一级，设置一名家长，经常对留守老年人展开慰问活动，看望照顾孤寡老年人，逐渐扩大了社会影响，赢得了普通村民的支持，参加协会的老年人逐渐增多。

社群网络培养了普遍化互惠惯例，密集的社会互动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向大众释放出某些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在长期的互动中，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结构，社会网又会产生集体行动与场力。[17]这些新乡贤群体不仅具有组织才能和组织愿望，在动员老年人的过程中积累了权威，并且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重建了社会关系网络中，并且高度动员了普通老年人参与到组织建设，从而实现老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老年人群体在自组织的运作过程中获得了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变为了社会的一种资源，精神状态良好。

2. 契约规范与监督机制的建立

自组织养老模式要形成有效可持续的运作需要建立一套规则，老年人群体均能遵守这套规则，并能互相监督。

(1) 契约规范的建立，赋予了组织协调的权威。布坎南认为社会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方面在“真”和“善”等具有价值判断性取向的引导下，人们逐渐认识到有益的规则；另一方面，通过人们的讨论、分析、游说和相互协商等参与过程形成的规则。而后一种规则经过公共会议的讨论协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一种民主化的契约规范的形成过程。在自组织养老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协会的组织体系成立之后，理事会便向老年群众公开征求协会的组织原则，运作方式，如何开展活动等各项意见。协会召开了多次全体大会，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多次民主协商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会对协会成员形成一定的强制力，约束个体的日常行为逻辑，并且此种约束力来源于协会成员的一致性授权，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能够增进全体成员的整体性福利。

(2) 公共讨论赋予了老年人集体行动能力。通过民主化讨论建立了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制度关联，老年人具备了集体行动的共识，从而增强了组织运作的公共性，进而产生了强大的公共舆论，有利于形成村庄中的社会监督。村庄社会舆论作为“第三种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惩戒监督功能。当面临少数人对组织的公共决策持反对意见时，村庄社会舆论便能发挥重要功能。当组织内部

存在普遍的社会舆论压力时，那些对组织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内心便会有所忌惮，行动会有所顾忌，便不会产生越轨行为。从积极方面而言，这种监督是本质上是一种正向的激励，老年人群体通过集体讨论形成了公共决议，共同开展一种活动，协会成员都会积极地参与并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3. 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

有了组织主体，组织的运转也离不开资源的支撑。资源是保证组织运作的必要条件。“老协”在运作过程中，新乡贤群体积极链接资源，维持了组织运作。自组织养老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村庄既有的社会性养老资源，并且搭建了国家资源和村庄社会对接的平台。

(1) 内生资源激活。在组织创建初期，新乡贤群体积极参与支撑了组织的初步运转，例如物质捐赠和时间。在“老协”成立之后，新乡贤群体积极倡导普通群众参与组织的各项活动。新乡贤群体不仅是协会的组织者也是积极付出时间和精力群体，从而带动了一般群众的积极性。

(2) 外生资源链接。组织常规化运转之后，作为组织领导者的新乡贤群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的“老协”的运作模式的宣讲与考察，从而扩大了组织的社会影响，也给组织带来了不少社会捐赠。例如，协会的领导者参与湖北省老龄委组织的培训班学习，恩施市慈善总会在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授牌为慈善成员单位，市民政局来老年服务中心确定召开全州互助式养老现场会。同时，媒体的广泛宣传也扩大了协会的社会影响，为协会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一些社会个体和公共机构也为协会捐赠了相关物品。

4. 组织认同与互助的可持续

经过长期的组织活动，老年人对组织有了更加切身和深刻的认识，老年人群体建立了对“老协”的组织认同，为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奠定了基础。

(1) 组织的运作规则是经过老年人群体的广泛多层次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赋予了组织认同的规则基础。老年人群体认同组织规则并遵守组织运作的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老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重大节日的文艺活动，节假日的外出旅游，为老人生日和过世提供的慰问服务、高龄老人的走访活动等等。这些活动拉近了组织与成员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老年人群体对“老协”的心理期待。

(2) “老协”所在的场所成为了老年人群体的重要活动空间。许多老年人表示，每天不来协会，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呢。在公共性空间，老年人群体能够自我组织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显得不再孤独失落。在公共空间的长期交往中，老年人群体更加熟悉，老年人群体之间互帮互助，比如组织会员结对，成立互助协会小组，帮助空巢老人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有了组织支撑，低龄老年人对以后的生活有了预期，更加乐意对高龄老年人提供帮助。

“老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老协通过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方式，将边缘位置的老人拉到村庄结构的中心位置，老年人由隐性力量成为显性力量。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社会性死亡”到“社会性复活”的转变，使老人们活的更有尊严，更有主体意识，更敢于和乐于去表现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老年人的生命价值有了意义。

四、“熟人社会”：自组织养老模式运作的社会基础

在互助养老理念的指引下，自组织养老模式改善了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了老年人生活幸福度。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结构，具有“信息对称性”和“规则性”等特点，村庄社会中相互知根知底，具有约束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等特点。村庄蕴含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村庄内部存在的社会性激励和生活空间的自在性为老年人互助提供了社会基础。

1. 社会资本与老人互助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入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18]村庄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实现老人互助养老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社会基础，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则是维系自组织持续运转的动力。

自组织养老模式实践的场域是在村庄社区，村庄是一个由地缘、血缘等先赋性关系而组成的熟人社会，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费孝通先生认为，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因而大家对彼此都是“知根知底”。^[19]村民长期生活一般会形成高度认同的行为准则，而且存在面子人情等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社会联结程度高。这种社会联结既是人与人关系的长期互动，也是农民之间面对具体的事件中行为逻辑。老年人群体嵌入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且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个群体，通过组织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社会认同机制。熟悉是老人之间互助的基本前提，常年在村生活的经历，让老人之间产生了难以言表的感情，共同的生活经历、信息对称、历史记忆、亲密情感使得互助合作成为可能。从基层来看，现阶段村庄的熟人社会底色仍旧明显，互助伦理与帮扶网络依旧能发挥效能。熟人社会内部存在互助机制，它使老年人生活困顿溢出家庭后能被村庄这一级所吸纳，而正是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照看”或“帮扶”，实则是对老年人养老生活的社会支持。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将分散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激活社会资本来提高组织效率。反过来，自组织建设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不断生成和加强的过程。互助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因为信任产生交往，并在这一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和支持。虽然村庄人口大量外流，但是老年人依旧是村庄生活的主体，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亲密社群内部的有机团结，老年人之间有强烈的互助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建设便有了社会基础。以往，虽然老年人有互助的需求，但是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十分有限，次数较少，局限于亲密的小团体关系，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老协”建立之后，将这些隐形社会资本显性化，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产生熟悉亲密感，生产出社会资本，进一步推动了自组织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2. 社会性激励与双向互惠

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村庄内部的互惠规则推动了互助行为的产生。换言之，老年人能够在互助行为中获得收益，即社会性激励和物质性激励。

老人对于自身的奉献精神具有长远且稳定的预期。由于村庄生活的稳定性，互助交换不是一次性的、临时的或短期性的交易，而是基于对未来长期的稳定的时间的预期性。“老协”中的积极份子村庄中的精英群体，也遵循着人情的逻辑，他们与村庄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他们有回报乡梓的义务。同时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村庄社会中存在着互帮互助的传统，这也意味着人情具有积累性和延续性特征，参与了农村自组织的建设和运转，同时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也获得了其他村民的认可与帮助，形成了一个正向激励。与此同时，社区内部相对封闭的环境则有助于形成了一套舆论评价机制。那些真正愿意为老人奉献的人，代表老人利益且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老人将在互助组织内部获得好的口碑，并享有群众的信任与认同。而那些素质较差的人则会被群众甄别出来，最终提升了老人的一致行动能力，促使互助合作行为的达成。

从自组织养老模式实践过程而言，通过对村庄关键人物的动员，给予一定公共身份，从而激发关键人物的奉献精神、公心、爱心等社会能量，再由关键人物来组织带动其他群体参与，形成村庄内部“差序参与”的结构，让不同身份的老年人都参与进来。发挥老年人的优势。这些做法有助于将分散的老年人整合进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老年人在互助组织内部的连带性程度比较高，从而实现了老人之间从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在乡村社会内部，助人行为并不是单向度的展开，而是在自组织内部实现了利益的均衡，在服务过程中再生产出了价值，践行了“助人自助”的目标。“老协”的积极份子和养老服务对象之间生产了双向互惠。

3. 自在性空间与老人生活自主

熟人社会属于自在性的生活空间，老年人在其中感受到的是自由、自在，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轻松感。村落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也是农民生命意义再生产的价值空间，更是传统养老秩序维系的公共文化空间。〔20〕农村老年人在村庄养老与乡村熟人社会相结合给予老年人以经济和心理支持。

(1) 乡村社会内部存在“适老型”经济机会空间。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而言较为便利，农业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较为发达，减轻了对体力的倚赖，老人有了较好的农业种植条件。低龄老人能够普遍依托土地和城乡经济空间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同时通过劳动获得价值意义。例如，当地的低龄老年人主要的劳动方式是采茶和管理茶园，每年从清明前一直到农历八月份都可以采茶，老年人采茶具有自主性，只要想干可以天天到茶园采茶，一天采茶卖出去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一年有一两万元的收入，身体条件好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一天也可以采茶二三十元，对于老年人养老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下半年采茶结束老年人会闲下来，但是每天到茶园除除草、看一看等管理茶园的劳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村庄是实体单元，熟人社会为农民提供了养老的生活空间，给予老年人养老以文化和心理支持。良善的养老模式不仅涉及到经济供养，还包括精神愉悦，农民的养老离不开村庄熟人社会。村庄在情感交流、价值感、社会交往、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土熟人社会是老年人的原生生活环境，在熟人社会中进行养老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预期，按照老年人的说法“过得不自在，身体再好都会被拖垮”。在熟人社会中，老年人除了具有在场感，还有主场感，对周边事物具有很强的熟悉性和把握性，正因此，在这个空间中养老，他们才不会有拘束感，反而显得很自在。在他们看来，“去敬老院就像坐牢一样，一点都不自由，每天几点起来几点睡几点吃都要听人家的安排”，“住那里面就是数着日子过，过得是啥，过得就是‘活着’，不是生活”。相较于机构养老的空间陌生感，老人置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接受相对开放灵活的管理，会更自由放松。

五、结语与讨论

面对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困境，通过发掘基层自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自组织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从恩施市G乡的实践来看，通过激活社会养老资源，依托熟人社会将在村老年人组织起来，形成生产生活和情感的互助体系，进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生命更加有意义。农村自组织养老模式常规运转关键在于培养村庄社会资本，重构农村社区共同体意识，防止其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不断流失，从而陷入内生资本不足的困境，其路径是通过增进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来加强社会建设，以自组织的方式提升老人的组织化程度，动员熟人社会资源。

首先，加强村庄内生性组织能力建设，服务老年人养老生活。村庄作为农村老年人养老和生活的主要空间，但是由于人口流动对农村内生性社会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典型的是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弱化，甚至难以开展有效的组织和服务职能。地方政府在供给资源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加强农村内生性基层自组织能力建设，比如加强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老年人协会等组织能力建设，以政府公共资源撬动农村内生性主体和资源力量，发挥农村内生性组织和资源作用，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农村内生性养老秩序的良好循环。

其次，满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养老需求。农村精英老人经济较为富足，也希望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得到社会认可，就要充分发挥其乡贤作用；普通农村老人在经济、物质上仍需要一定帮助，尤其是在精神娱乐上十分匮乏，需要广泛开展各类文化互动。

参考文献：

〔1〕邬沧萍，王琳，苗瑞凤. 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 人口研究，2004, (01).

-
- [2] 聂建亮, 吴玉锋. 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 基础, 路径与提升策略[J]. 农村经济, 2021, (12).
- [3] 刘超. 城镇化中的空间排斥与老年人地位的边缘化[J]. 学习与实践, 2017, (03).
- [4] 李迎生.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J]. 社会科学, 2012, (09).
- [5] 史薇, 谢宇.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研究[J]. 西北人口, 2015, (01).
- [6] 穆光宗. 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05).
- [7] 左冬梅, 李树茁, 宋璐.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 (01).
- [8] 杨宗传. 居家养老与中国养老模式[J]. 经济评论, 2000, (03).
- [9] 包国宪, 刘红芹.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2, (02).
- [10] 夏志强, 付亚南. 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3, (04).
- [11] 朱冬梅. 养老服务需求多元化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建设[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04).
- [12] 贺雪峰. 互助养老: 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05).
- [13] 班涛. 社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转型期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探讨与完善对策[J]. 农村经济, 2017, (05).
- [14] 纪春艳.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J]. 农村经济, 2018, (01).
- [1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16] 罗家德, 孙瑜, 谢朝霞等. 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0).
- [17] 罗家德, 王竞, 张佳音等. 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J]. 社会, 2008, (06).
- [18]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9]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0]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J].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06).